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kesi Zhuyi Jingdian Zhuzuo Daodu Congshu



康沛竹 江大伟◎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kesi Zhuyi Jingdian Zhuxue Daodu Congshu

《新民主主义论》 导 读

康沛竹 江大伟◎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 康沛竹等编著 —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9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 艾四林总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80219-895-1

I. ①新… II. ①康… III. 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研究 IV. ①
A84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181 号

图书出品人 / 肖启明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张霞 刘春雨

书名 / 《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作者 / 康沛竹 江大伟 编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8

字数 / 89 千字

版本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河北省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80219-895-1

定价 / 20.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

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而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 120 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有 50 卷（53 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出齐后将超过 60 卷，《列宁全集》也有 38 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 10 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 年 11 月 11 日于北京清华园

目录

—• CONTENTS •—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I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背景 /001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002

二、成书及出版情况 /019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
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025

一、科学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026

二、具体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031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
纲领 /047

一、分析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048

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049

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052

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055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论》有力驳斥了关于中国革命前途和
指导思想的几种错误言论 /063

一、批驳了资产阶级专政论 /064

- 二、批驳了“一次革命论”的观点 /067
- 三、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异同 /071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论》的意义 /077

-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意义 /078
- 二、《新民主主义论》的实践意义 /094
- 三、《新民主主义论》的现实意义 /110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背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伴随相持阶段的到来，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国际形势

1. 英、美等国的远东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采取表面“中立”的绥靖主义政策。英、美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日本政府随即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要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公开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否定，这样，它与英、法、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英、美等国为维护其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一方面，开始加强对华援助，帮助中国抗日，希望借中日战争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绥靖主义的妥协政策，避免造成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开始支援中国抗战。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直接威胁到英、美在东南亚的利益。为防范日本的南进，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了进一步支持的态度。但美国在开始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仍然没有中断和日本的

贸易关系，依旧卖给日本大量的战略物资，希望借此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英、法等国为应付德国的进攻，无暇东顾，日本政府为呼应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进一步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11月，英、法同意日本所要求的撤走其在中国的驻军，力图与日本达成妥协和让步。英、美等国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造成亚洲形势的进一步危机。

2. 日本对华进攻政策的调整

1938年秋，日本虽然已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半壁江山以及重要交通线，掠夺了大量战略资源，但是，日本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由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随着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兵力的分散以及长期战争的消耗，其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到1938年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投入关东军8个师团，只有1个师团留在国内。而此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已达44.7万多人。同时，由于战争扩大，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造成日本本国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税收加重，人民和士兵的反战、厌战情绪上升，国内危机日深。中国抗战方面，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但抗战仍在继续，使得日本不能不使用一定的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日军的后方遭到严重威胁，进退两难，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支援、相互配合的持久抗战局面。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日

本利用欧战使英、法、美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苏作战以及同英、美等国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步伐，所以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近极限，因此，日本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进攻政策。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开始从反蒋转为拉蒋。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这就改变了1938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待真正能与其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的对华政策。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并表示只要蒋介石降日反共，日本就同他“合作”。1939年3月，新任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讲时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攻势为辅的对华政策，确立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的对华方针。其意图在于借助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以承认其地位为诱饵，诱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

在军事上，为了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摆脱战略被动，日本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从1938年10月起，日军对华作战方针开始转向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确保已占领的地区而不是再扩大进攻了。其主要军事打击目标是以敌后战场为主，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确保对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而对于正面战场，要求把兵力配备在最小限度内，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7月9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其中的8个月内以85%的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围攻和“扫荡”，其中，只有1个月以15%的兵力对国民党军进

行了局部进攻。正如朱德所说：“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2] 日本军事方针的调整，目的也是企图以此诱导蒋介石降日反共。

（二）国内形势

1. 国民党反共投降倾向日益增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改变了过去军事进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加之英、美等国对日本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群众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始发生动摇，妥协退让倾向日益增长，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逐渐将其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亲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一伙就开始散布失败主义的言论。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声称“中国比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8月3日，又发表讲话说：“和呢，是会吃苦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他公然鼓吹“战必打败，和未必打乱”的对日妥协投降的论调。同时汪派成员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宁等人组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在国民党内散布投降主义言论，酝

酿对日的“和平运动”。南京沦陷后，汪派集团的投降主义活动开始从宣传走向积极与日本勾结的实际行动。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华策略出现调整，汪精卫集团更加活跃起来，加紧了与日本勾结的步伐。1938年11月3日，在日本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这里所说的“更换人事组织”，实际是在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在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等积极响应，立即派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秘密到上海同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等进行谈判。11月20日，与日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卖国文件，双方商定上述协定一旦公开发表，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准备成立新政府，实行中日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实施其叛逃计划，从重庆乘机经由昆明逃往河内。1938年12月22日，以“日汪协定”为基础，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向国民党政府呼吁：“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同时宣称，日本愿“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远见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3]。以此来策应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活动。12月29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29日）电”的方式，公开响应近卫声明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建议国民党依此三点，“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同时，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至此，汪精卫集团的降日反共面目暴露无遗。此后，在日本的授意安排下，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集团盗用中国国民党名义，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精卫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并通过了所谓党纲及调整中

日关系及“和平建国”等提案。1940年，又在日占区成立了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开走上了投降叛国的道路。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主张抗战，但是在英、美的压力和日本的诱降下，表现出严重的妥协退让倾向，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4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虽然仍声言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但是他对抗战到底的“底”却作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现在要打到日本亡了，那不可能。或说武汉失守了就算到底，那太离奇了。”“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收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4]从蒋介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换言之，就是可以以牺牲中国东北为条件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这充分表明了他在抗日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态度。除抗战问题外，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是五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议题。随着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与恐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5]。为此，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议秘密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规定国民党嗣后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发展，扩张势力，以与中共相对抗。同时决定设立专门的反共机构即“防共委员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

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这些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飭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

在这种反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对中共极尽防范、排挤、打击之能事。从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不断加剧。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并增派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然名义是为了抗日，但是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39年初，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指使张荫梧等部在华北进行反共军事摩擦，袭击八路军，摧毁抗日政权。4月30日，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山东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1350人，被扣812人。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在华中地区，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袭击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围攻鄂东新集的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大批群众。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家属及当地群众200余人，制造了“确山惨案”。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约30余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包围、封锁陕甘宁地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先后制造反共军事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从而使反共军事摩擦不断升

级。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趋猖獗，由制造小规模军事摩擦发展成为对陕甘宁地区、晋西地区、太行山地区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地方反共势力的配合下，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此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奉蒋介石密令，指挥军队和保安队围攻陕甘宁边区，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枸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并俟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进攻。同时，蒋介石还指使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袭击八路军军政机关，企图迫使八路军退出绥德地区，以此配合胡宗南的进攻。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在晋西的中共领导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大举破袭，对日军开展“冬季攻势”。正当决死队执行任务之时，阎锡山却令其在晋西的6个军，向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在晋东南，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向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进攻，先后捣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群众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在晋西北，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并组织第四纵队内部的反动军官搞叛乱。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0年1月，盘踞在冀南的南宫、枣强、巨鹿、广宗、威县、清河地区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反共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开始对共产党发起了攻势。他们网罗了一批反动文人、政客，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

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托派分子叶青公开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6]。他在1939年10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更是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7]。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通过不同方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灌输早被他阉割的三民主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 发扬党德 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演，要求国民党员坚定对蒋介石之三民主义的信仰，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大德”，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1939年3月，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并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以他所鼓吹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并且鼓吹“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8]。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其用意就是企图用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此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

2. 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走“中间道路”的主张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行为和言论，引起了广大